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Brantly Womack

(1917-1935)

霍伟岸 刘晨译

(插图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Brantly Womack

(插图本)

霍伟岸 刘晨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 (插图本) / (美) 沃马克著;
霍伟岸, 刘晨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 萧延中主编)

ISBN 7-300-05078-6

I. 毛…

II. ①沃…②霍…③刘…

III. 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IV. A8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552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

(插图本)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 著

霍伟岸 刘晨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5×23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0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 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为: 比较政府与国际关系(中国、越南)。他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国政治》(第三版, 合著); 编著有《历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 传媒与中国公众》、《中国的选举改革》; 并且在多种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了大量关于亚洲政治的研究。曾为富布莱特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研究员和梅隆研究员, 并获得过多种研究基金的奖励。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 问 龚育之 金冲及 朱佳木
石仲泉 李君如 李忠杰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大勇	石仲泉	朱学勤	任剑涛
杜 蕾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李向前	李 捷	李景治	陈 晋
宋新宁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萧延中	景跃进
程 农			

总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

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龚育之、金冲及、朱佳木、李君如和李忠杰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

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中文版序

我很荣幸我的这本《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能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我要感谢主编石仲泉和萧延中将这本书收录在他们编纂的享有盛誉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之中。同时，我要对译者霍伟岸和刘晨的辛勤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很高兴我关于毛泽东的两篇论文也被收录其中。

我于1970年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研究毛泽东。与那一时期我的大多数同事不同，我的兴趣不是源自于“文化大革命”，而是源自于将毛泽东的思想与从黑格尔到列宁的欧洲左派的经典思想相对比。到芝加哥大学之前，我曾经学习过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1969年到1970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当我在邹说（Tang Tsou）教授的指导下开始阅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我被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关注所震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声称实践先于理论，但只有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于构建一套综合的批判理论，恩格斯关注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唯物辩证法，而列宁在与其他左派争论时判断正确性的标准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对于毛泽东而言，正确的政治领导才是主要问题，正确性是对于具体情况的适当性问题，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忠诚。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本本主义者”之所以错误，不是因为他崇拜了错误的书籍，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够理解抓住具体现实的重要性。

本书附录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写

于1972年，并于1974年发表，该文是从对中国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景之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入手的。毛泽东1937年的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赞成实践由于作为理论的背景、内容和目标而具有一种优先性。这当然不是有意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甚至有意进行的一种独立的理论创新，相反，它表达了对以下这些方面的认识：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经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篇论文的结尾批评了毛泽东的实用主义的灵活性，指出这种灵活性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化所造成的困难。尽管该文写于毛泽东逝世前四年，但读者仍可以从中看到后来在继承权的讨论中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之分歧的先兆。

这篇文章很自然地引出了本书的研究计划，因为如果先有实践，后有理论，那么就应当从毛泽东当时所处形势与他的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来研究毛泽东自己的思想。本书的基本研究目的是在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具体情况中分析这一思想，而非将其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体系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不得不以毛泽东最早时期的努力为开端。但《毛泽东选集》中最早的文章写于1926年，而且其中许多原文被省略和改动。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竹内实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集》^[1]，那么本书将是不能完成的；我的研究也受益于其他学者的开创性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这项研究开始于1974年，完成于1981年。

鉴于这本书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已经有它自己的导言，对其内容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想就这项研究对于我自己关于毛泽东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作一评述。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对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毛泽东感兴趣，但对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现在的研究要求我再现他作为一名活动家的发展历

程，并且感受他所想做的和他认为可能去做的事情之间的互动。在研究过程中，毛泽东致力于有效的行动，以及他对人民权力的信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看到1927年到1934年这段时期内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农村革命策略的思想就尤其令人兴奋。

在我看来，农村革命是后来这个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一项政治创新，也是毛泽东对历史最伟大的贡献。它证明了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力量即便在一个巨大而贫穷的国家里也可以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的力量”，那么毛泽东就对民主理论做出了一个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的贡献。农村革命策略是在1927年后，由于红军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而凸显的。毛泽东根据实践的需要做出了既有创造力又有效的回应，一个综合的农村革命范式从他的成功与失败中诞生了，在抗日战争中这个范式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并被加以应用。

这就产生了两个更进一步的研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另外两篇论文的主题。第一个问题是农村革命胜利的原因——在越南以及中国——和胜利之后在共产党与民众之间保持紧密关系的问题。在1986年发表的《共产党与人民》中，我主张成功的农村革命的机制是，党作为一个“准民主系统”来发挥其功能。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都是与有更好的资源、通讯技术和国际支援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面对这种局面，共产党惟一能够利用的资源是农民阶级的支持，他们不关心政治并且深受剥削。也因此，共产党必须通过密切联系农村群众的方法来对他们进行动员，其政策也必须是尊重群众的政策，必须去做群众希望的和群众认为可行的事情。共产党尊重群众的行为并不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形式意义上的民主，但是它不得不对大众的利益和意见做出敏捷的反应，以便在与强有力的对手的斗争中生存下来。

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尽管仍然强调群众路线和大众支持的重要性，但是共产党和作为个体的干部们

却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必须依靠大众的支持。“准民主系统”在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的竞争时期发挥作用，但现在那个对手已经被打败了，共产党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来组织支持者，作为个体的干部们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更多地依靠上级，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热情。这样做的后果是，可能会出现官僚主义。尽管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各种运动，但是这些并不能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即对于群众而言，党及其干部们不再处于危险的境地。一个国家一旦建立，只有民主体系方能要求领导人关注民众的利益和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在毛泽东逝世后，他在1957年到1976年期间的“左”倾主义政策遭到了谴责，但他直到1957年为止所取得的成功仍然得到了肯定。1957年发生了什么呢？难道毛泽东放弃了他早期的实用主义和对大众的关注吗？《毛泽东在何处误入歧途》一文认为（本文亦收入本书），在毛泽东的“左”倾主义时期，他的思想仍然具有连续性，但是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环境的判断，他原有的思想在此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任务的判断中，1957年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到1949年为止，毛泽东的实用主义灵活性指向的目标都是革命成功。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个目标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苏联为社会主义建设方法提供了一个实际的范例。但在1957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让人丧失信心，波兰和匈牙利的动荡和“百花齐放”运动的失败激起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关注。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处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历史边缘。但惟一能够找到的模式就是修正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傲慢自大的反面教材。因此，毛泽东感到他必须带领中国进行一场重大的实验，在实验中犯错的确是可能的，马克思关于终极共产主义社会的只言片语为这场实验提供了新的目标。

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的失败——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巨大的，而且假若没有他个人的参与它们

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失败的根源并不是他放弃了实践的行动主义或对群众的信仰，而是他对不可实现的目标的追求。在我看来，毛泽东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企图超越世界的不可能性，而是他没有能够直面他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对于政策退让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实用主义态度，但对政策反思却不是这个态度。因此，错误导致了伪善和更多的错误，而不是切实的纠正和进步。

我在中国境外完成了这些作品，它们主要是写给非中国人的读者看的，但在写作过程中这些作品使用了有关中国的新信息。我有信心，读者们能够发现这项研究的有用之处。但这些许多年前的作品的用处，对中国读者而言一定是不同的。为什么要了解一个外国人对毛泽东所作的分析，在这些作品发表以后所出现的新文献与新研究又具有何种重要性？这些都是很值得回答的好问题。

对一些读者而言，看上去可能我关于毛泽东的观点缺乏足够的批判性，而且没有能够表达出许多中国人由于这种领导而遭受到的痛苦和损失，尤其是在“左”倾主义时期。实际上，任何外国学者都无法想像“文化大革命”或“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和期间日常的生活现实。局外人的视角不可能拥有局内人的个人真实性（personal authenticity）。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的研究从未试图取代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叙述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况且，我不认为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视角，比中国人的研究更为“客观”。然而，一种局外的视角确实有助于对毛泽东的内在理解。

第一，局外人的视角相对不受中国目前的政治和历史的约束。一部为美国读者所写的关于罗纳德·里根或比尔·克林顿的书将受到当前美国政治的影响，即使作者努力谋求一种客观性，但他所认为的关于其主题比较有意思的内容，也要受到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及在写作该书时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影响。一种不受约束的观点作为一个来自外部的新鲜视角可以是有用

的。当然，局外人的观点也只是相对不受约束的。

第二，一种局外视角提供了这样一个维度，即从内部不可能观察到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国的现实的东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和重要性可能在中国之外更加容易进行研究。比如，把毛泽东和胡志明作比较对一个对农村革命感兴趣的外国人而言是一种很自然的对比，但如果在中国或越南国内，作同样的比较会很困难，因为被比较的一方对于研究者而言比另一方更为亲密。

第三，一种外部视角可能更接近长期的历史视角。虽然局外人不是他所分析的社会中的一员，但他的观点并不比局内人的观点更缺乏真实性。如果我们想知道100年或500年之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局外人评价的范围可能会比局内人的观点更加接近最终的判断。局外人与当前的现实隔离开来，同时历史也与当前的现实隔离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对个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弱，甚至在同一种文化之中也是如此。如果由一个来自罗马帝国的学者对秦始皇进行研究，他的评价可能比汉朝人当时做出的反应更接近于历史的评判。当然，没有人能够改正历史的评判。但在评价历史的评判时，距离是一个因素。

关于中文版的另一个问题是新文献和新研究对于本书观点的有效性会产生何种影响。因为这本书不可能在《毛泽东集》出版之前完成，所以这样问就是正当的：在补充的材料出版之后它是否还值得一读？现在，毛泽东著作的收集与出版的确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毛泽东早期文稿》^[2]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新文本，尤其是毛泽东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作；而由斯图尔特·施拉姆编辑的《毛泽东的权力之路》^[3]，则提供了毛泽东1949年之前著作的最广泛的英文译文全集。而且，中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及其历史背景的研究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开花结果。所以，先前的研究必须做出何种贡献才能让人们觉得这本书有用？

我写过一篇关于“1937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新文献的评论

文章，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4]当然，在我这本书完成之后，有关1920年之前的毛泽东的文献记录大大增加，我会鼓励任何对毛泽东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怀有特殊兴趣的人去阅读这些材料，尤其是毛泽东对于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评论。尽管如此，这些新材料与我的分析并不发生矛盾，尤其就1919年以后的材料而言。更确切地说，它们充实了原来能够找到的文献，而且为更深入地分析毛泽东最初那些强健有力但又有些不太成熟的自我思考打下了基础。如果现在让我再重新写这本书，那么在第一章将会有大量的补充内容，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描述也会得到改进，但是整体的结构和内容仍将保持不变。

在未来的20年，我希望能毛泽东的文本文献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重大进展。至少，可以期待中文原文配以施拉姆译文的便捷式版本能够出版。当然，最好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尤其是1930年之后的，能够提供给我。最终，对我来说最便利的就是能够拥有一个电子数据库，可以进行检索，并具有中英文对照的功能。如果这些都变成现实，可能我会重写这本书。

关于这个中文版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有些人名和引文的中文原文难以查到。虽然绝大多数来自毛泽东本人的引文均查到了原文，但是由于一些历史材料的文本已经不在我手中，因此译者不得不将我的英文翻译再转译回中文，在准确性和优雅性方面的任何损失当然完全应由我来承担责任。

我深深地感激读者对我的研究的关注。同时为它的许多错误和疏漏表示抱歉。我希望本书对毛泽东研究的国际学术界所作出的些许贡献，能够激发他人取得更大的进步。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

夏洛特斯维尔，弗吉尼亚，美国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SA）

2003年7月

译者的话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The Foundation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的英文原著在1982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作者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教授的第一部专著，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雷蒙德·怀利（Raymond F. Wylie）和理查德·利维（Richard Levy）等都先后发表了评论文章。^[1]尤其是施拉姆对该书的评价很高，称作者“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研究计划”^[2]。在这些评论文章陆续发表之际，国内研究界也开始关注此书，并将其主要观点和相关评论摘要编译介绍给中国读者。^[3]然而大多数中国读者竟然一直等到20多年后方才得以观其全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译本不仅完整翻译了原著，而且把作者在从事该研究前后所发表的两篇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重要论文也作为附录收录进来，从而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脉络。

沃马克认为，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原则，这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不同，他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是源自于‘文化大革命’，而是源自于将毛泽东的思想与从黑格尔到列宁的欧洲左派的经典思想相对比”。所以，中译

本附录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直接导致了本书的研究计划。虽然雷蒙德·怀利指出，“1917—1935年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以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都不是什么新观点，因为早在1951年陈伯达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就已经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4]但是，沃马克著作的价值显然不在于他对这两个观点的重申，而在于他的论证方式，以及他把“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问题所推进的深度。沃马克的论证方式是“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便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作者“试图用它们最初指代的对象来提出新兴的政治概念，并讨论这样一些主题——当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在面临着实践决策时，会把它们当作重要的和紧迫的主题来加以描述”。“按年代顺序从最初去研究各个发展阶段是重要的，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研究者才能得到所有相关的政策经验。这样一种方法并不预先排除关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概说，但我认为它能够把幼稚的概说与可靠的概说区分开来。”施拉姆也非常赞同沃马克的这种方法论，以至于他在评论文章中直接将沃马克有关其方法论的叙述部分大段地加以引用。^[5]利用这样的方法论，作者就不是在空泛地讨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命题，而是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并在相关的实践背景下把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化。作者发现，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比，只有毛泽东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对于毛泽东而言，正确的政治领导是主要问题，正确性是对于具体情况的适当性问题，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忠诚。”因此，毛泽东会着重关心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经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种复杂论证的步步推进正是在有关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毛泽东相应时期代表著作的细致分析而得以完成的。最终，作者围绕着“理论联系实